

##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運作及美軍特權：以1960年代美軍在臺犯案為例

郭彥伯

### 摘要

本文以1968年美軍協助盜墓嫌犯自清泉崗基地潛逃返美的藏匿人犯案為核心，探討戰後臺灣的美軍特權的形構與影響，並呈現為此提供重要法律架構的《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如何具體運作。本文首先梳理美國人在臺產生3種主要法律身分的歷史背景，包括擁有刑事豁免權的使館與軍事顧問團人員、受協定保護的駐臺美軍，以及僅受中華民國法律管轄的普通美僑，並指出這些身分如何在外交協商中持續變換。美軍藏匿人犯案是中華民國首次針對不屬於特別嚴重刑案的犯罪，向美方要求撤回「捨棄管轄權」，本文梳理其協商過程，並反映聯合委員會作為雙方協調機制的功能及侷限，並進一步探討美軍特權如何延伸至基地空間及物流管制，形成一種可供人員與物資流動的例外空間，甚至可為非美軍人員所利用。藉由分析這些案件，提供對駐臺美軍享有諸多特權的歷史理解，並反思「治外法權」與主權關係的議題。

關鍵詞：駐臺美軍、管轄權爭議、治外法權、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司法主權



# **The Practice of the Sino-American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and U.S. Military Privileges in Taiwan: A Case of Personnel Concealment in the 1960s**

Yen-bo Kuo\*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case of assistance provided by the U.S. military to a tomb-robbing suspect for the latter's escape from the Ching Chuan Kang Air Bas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8. It explores the formulation and impact of U.S. military privileges in postwar Taiwan, for which the Sino-American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SOFA) functioned as a key framework. The study first review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primary legal statuses of Americans in Taiwan: personnel of the U.S. embassies and military advisory groups with criminal immunity, U.S. troops stationed in Taiwan protected under the SOFA, and ordinary American expatriates subjected to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These statuses apparently might be negotiable under diplomatic considerations. The article then examines the negotiations surrounding the first-ever ROC request to recall the waiver of jurisdiction for a non-major crime under the SOFA, highlighting the func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Joint Committee as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It also delves into how U.S. military privileges extended to spatial and logistical controls within the bases, forming “exceptional spaces” accessible to personnel and resources, including non-military individuals. Through these analys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vileged nature of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aiwan and reflects on the broader

---

\* Doctoral Studen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issues of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sovereignty.

**Keywords: U.S. troops in Taiwan, Jurisdictional Disputes, Extraterritoriality,  
Sino-American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Judicial Sovereignty**

#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運作及美軍特權：以1960年代美軍在臺犯案為例<sup>\*</sup>

郭彥伯<sup>\*\*</sup>

## 壹、前言

1966年，臺灣省警務處刑警大隊收到一樁古怪的自首密告，自首者是一名自小在香港成長的澳洲人麥士威（Maxwell），他供稱自己涉入一起盜墓計畫，同夥人員是原先要一起合作籌組汽車裝配公司的兩名美國人白濟傑（Harry Pelziger）及郝斯曼（Jack Horsman）。刑警大隊對此密告感到狐疑而不敢輕信，於是先請麥士威佯裝配合盜墓計畫、擔任警方內線，希望能在犯罪現場以現行犯逮捕盜墓同夥。在刑警大隊、外事警官和麥士威的合作之下，警方順利在10月19日凌晨，逮捕了欲盜挖板橋林本源家族祖墳的兩名美國人。<sup>1</sup>

---

<sup>\*</sup> 感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林淑芬教授先注意到這起藏匿人犯案，並提供國軍史政檔案和寫作建議。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冠任助研究員在本文撰寫期間提供的寫作建議和精闢見解。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國史館「戰後臺美關係——從經濟發展到國防安全學術討論會」，感謝洪紹洋、蕭道中、趙相科等與會先進提供的意見。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精闢的修改建議，使本文在結構、細部論證上能更進一步。

收稿日期：2025年1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年4月17日。

<sup>\*\*</sup>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sup>1</sup> 〈外僑盜墓案「風」情畫〉，《聯合報》，臺北，1966年10月21日，版3。另說明：本節書寫關於盜墓案、藏匿人犯案之過程，文中所有資訊皆確實出自註腳1至9，但為了行文順序和讀者閱讀方便、避免過於冗長之反覆引註，有些來自其他筆註腳之次要資訊，就不一一標註。比如，美國人原名並未見於本註腳1之《聯合報》報導，而來自註腳7之起訴書。

在後續的調查裡，麥士威一開始只認為這是一起古墳探勘計畫，在得知實為盜墓後，便尋求管道向當局自首，因此檢警不予起訴，只命其儘快離境返回香港；郝斯曼對犯行坦承不諱，並供出該盜墓計畫的另一名臺灣主謀王道。<sup>2</sup>王道自政治大學西語系肄業，1961年因搶奪路人皮包案，遭判刑6年，刑滿3年半後假釋出獄，現為軍人。由於教育程度不低且通曉外語，王道在獄中結識因國際販毒案而服刑的白濟傑，住在板橋的王道以「林家祖墳埋有奇珍異寶」<sup>3</sup>說動白濟傑，才有後續這樁共同策劃的犯行。白濟傑原先不願配合調查，在得知麥士威和郝斯曼皆已坦白犯行後，才願意寫下自白書，供出完整罪行。<sup>4</sup>

這起案件看似罪證確鑿，白濟傑、郝斯曼等因涉嫌盜墓案，於1966年12月經臺北地方法院分別判處9個月及5個月有期徒刑，豈料案件在1967年5月的高等法院逆轉。法官接受兩人所稱僅為尋寶，並不知挖掘處為墳墓的辯解，改判無罪，引起社會譁然，檢察官不服上訴。<sup>5</sup>1968年最高法院發回高院更審，兩人才又遭判同一審的9個月及5個月刑期。對於高院更審判決，白濟傑放棄上訴。這其實頗為異常，因為白濟傑先前犯下的販毒罪刑期未滿，目前為假釋狀態，若再判決定讞，就要一併執行剩餘的5年刑期。直到檢方又依詐欺侵占他人財物，起訴兩人，這才發現兩人早已不知所蹤，遂發布通緝令。<sup>6</sup>

1968年7月，這起原已受社會注目的案件又爆發新發展，且這次牽扯到駐臺美軍。<sup>7</sup>郝斯曼在1966年曾結識美國海軍供應司令部的士官杜蘭（John F. Durand），接著又認識杜蘭的部屬克萊孟斯（Dale W. Clemmons），兩人曾短暫共同分租公寓。當郝斯曼涉入的盜墓案在1968年3月判決定讞後，郝斯曼便和杜蘭商討偷渡潛逃事宜。據省警務處調查，當時美國大使館領事米勒（Paul

<sup>2</sup> 〈麥士威落得乾淨 警方命近期離境〉，《聯合報》，1966年10月21日，版3。

<sup>3</sup> 遭盜掘的為林府鄭太夫人之墓，其於清光緒年間晉封一品夫人，因此王道懷疑藏有陪葬珍品。

<sup>4</sup> 〈外僑盜墓案 查出主疑犯〉，《聯合報》，1966年10月21日，版3。

<sup>5</sup> 〈美僑盜墓案二審判無罪 檢方不服上訴〉，《經濟日報》，臺北，1967年5月24日，版5。

<sup>6</sup> 〈白濟傑又起訴 目前行方不明 警方查緝行蹤〉，《中央日報》，臺北，1968年4月7日，版3；〈地檢處下令 通緝白濟傑〉，《聯合報》，1968年4月13日，版3。

<sup>7</sup> 〈涉嫌幫助郝思曼出境 兩美軍將受偵查〉，《經濟日報》，1968年7月23日，版5。

Miller) 曾與杜蘭和郝斯曼商談，勸郝斯曼偷渡出境。最後由杜蘭計劃郝斯曼向克萊孟斯借用其制服、軍帽和軍人證，於4月9日晚間前往臺中公館機場（清泉崗基地），隔日搭乘飛往琉球那霸之航班離臺，經日本再潛返美國。<sup>8</sup>

此案爆發後，由於米勒為大使館外交人員，享有外交豁免，對其調查不了了之。<sup>9</sup> 杜蘭及克萊孟斯兩名美軍協助郝斯曼潛逃，則涉嫌犯下《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的藏匿人犯罪。<sup>10</sup> 此時已生效的《在華美軍地位協定》，除了殺人、強姦等6項特別嚴重的犯行，中華民國將捨棄（waiver）對於犯罪美軍的刑事管轄權。<sup>11</sup> 而刑期在2年以下的藏匿人犯罪，顯然不屬上述特別嚴重的犯罪。<sup>12</sup> 然而由於這起案件受到矚目及其涉及的司法主權問題，中華民國決定向美方提出撤回捨棄管轄權（recall the waiver）要求。這是中華民國首次針對不屬於協定內所稱嚴重的犯罪行為，提出撤回捨棄管轄權的外交要求。幾經交涉，美方最後同意中華民國的要求，將杜蘭交中華民國進行司法審判。地方法院最終判處杜蘭7個月的有期徒刑，克萊孟斯5個月的有期徒刑，併得易科罰金。<sup>13</sup>

這起案件值得探究之處，不僅是曲折離奇的過程，以及所受到的社會關注，還包含以下值得思考的面向：第一，它顯示戰後美（外）國人在臺可能的多重法律身分，在不同種身分所涉及的規範與司法主權問題；由於藏匿人犯案並不屬於

<sup>8</sup>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起訴書」（1969年5月30日），〈中美後勤合作協定；美軍杜蘭藏匿人犯；美軍特權〉，《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11-07-02-13-05-004。

<sup>9</sup> 「關於美僑白濟傑與郝斯曼不法離境案，經查美國大使館領事米勒有教唆郝某逃匿不法行為，敬請參處」（1968年8月15日），〈中美後勤合作協定；美軍杜蘭藏匿人犯；美軍特權〉，《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4。

<sup>10</sup> 據當時《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二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杜蘭及克萊孟斯協助郝斯曼潛逃，便屬於「使之隱蔽」，當時檔案及報章皆使用「藏匿人犯案」一詞，本文亦沿用。

<sup>11</sup>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中關於刑事管轄權的協議，詳見下一節。

<sup>12</sup> 據聯合委員會的決議，最高刑期在3年以上才被視為較嚴重的案件，需要各案通知，參見「在華美軍地位協定聯合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1966年9月27日），〈歷屆聯合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115。

<sup>13</sup>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969年7月21日），〈中美後勤合作協定；美軍杜蘭藏匿人犯；美軍特權〉，《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4。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允許中華民國撤回捨棄管轄權的罪刑，藉由考察「在華美軍地位協定聯合委員會」（以下簡稱「聯合委員會」）在此一交涉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得以呈現條約如何具體被執行，以及在生效後仍存在哪些外交協商空間；這幾起案件不約而同顯示美軍在臺灣享有的特權，如何形成一種例外的空間或管道，使各式各樣管制外的人與物的流動得以發生。

既有對於臺美軍事關係的研究，多聚焦在宏大的外交戰略格局，例如韓戰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sup>14</sup> 國史館所編纂的《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中美協防》及《從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到臺灣關係法史料彙編》納入軍事援助、《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軍事及情報合作等重要議題，但對於《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及美軍在臺所涉及的一系列外交協商則較少觸及。<sup>15</sup> 關於在臺美軍地位協定的研究，多著重在條約簽署前的過程和事件，尤其是引發較多討論的1957年美軍雷諾（Robert G. Reynolds）槍殺劉自然案，受到最多矚目，大致上已替此案件及其效應提供相對完整的圖像。<sup>16</sup> 林桶法補充了雷諾所屬美軍顧問團的建置背景和法權問題；<sup>17</sup> 呂迅的研究將當時發生於日本的類似案件——吉拉德（William S. Girard）案進行比較；<sup>18</sup> 郭彥伯則進一步參考美國當時與各國簽署的

<sup>14</sup> 較廣泛引用的代表性著作，見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出版社，2011年）。

<sup>15</sup> 吳淑鳳等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中美協防（一）》（臺北：國史館，2013年）；吳淑鳳等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中美協防（二）》（臺北：國史館，2013年）；吳淑鳳等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中美協防（三）》（臺北：國史館，2014年）；吳淑鳳編，《從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到臺灣關係法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2023年）。

<sup>16</sup> 林正峰，〈從國際法之觀點論民國46年美軍雷諾殺人事件〉，《政大法學評論》，第4期（1971年6月），頁223-242；栗國成，〈1957年台北「劉自然事件」及1965年〈美軍在華地位協定〉之簽訂〉，《東吳政治學報》，第24期（2006年12月），頁1-68；Stephen G. Craft, *American Justice in Taiwan: The 1957 Riots and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6)。

<sup>17</sup> 林桶法，〈從劉自然案論述1950年代美軍顧問團的問題〉，收入黃克武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年），頁207-262。關於美軍顧問團設立的背景和開展，亦可參考蕭道中，〈從內戰到冷戰：韓戰與中美軍事合作的開展，1949-1950〉，《台灣史學雜誌》，第33期（2022年12月），頁88-112。

<sup>18</sup> 呂迅，〈冷戰時期的美軍雷諾茲案：兼與吉拉德案比較〉，收入杜春媚編，《冷戰時期的



協定版本，以及臺灣、日本兩起重大美軍案件給亞洲國家帶來的迴響。<sup>19</sup>

在這些前行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利用新聞報導及臺灣各機構所典藏的外交部檔案，將重點放在過去較少被關注的《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簽署「之後」，探討此協定實際如何運作、涉及哪些外交協商與爭議，並指出戰後美軍在臺灣所處的特殊狀態，不僅包括一般人較熟悉的司法管轄特權，亦涵蓋其他形式的特權。

## 貳、《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背景與協商： 在臺美國人多重法律身分的形塑

### 一、美國人在臺的法律身分：使館與顧問團人員、駐臺美軍與一般美僑

在進一步討論《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如何具體運作之前，有必要先明確指出，美國人在戰後臺灣並非只有單一法律身分，而是多重並存：（一）因外交特權而享有完全刑事豁免的使館與軍事顧問團人員，如大使館領事米勒；（二）受《在華美軍地位協定》保障、享有部分刑事豁免的駐臺美軍，如涉案的杜蘭與克萊孟斯；（三）完全受中華民國法律管轄的一般美國僑民，如涉嫌盜墓的白濟傑及郝斯曼。這種法律身分的多重性，正是理解美軍特權複雜性與動態變化的基礎，本節將進一步說明這些差異在歷史過程中如何形成，並如何藉由外交協商持續變動。

外交人員享有完全的刑事豁免權已屬國際慣例，但戰後臺灣有刑事豁免權的不僅是各國使館的外交人員而已，還包含大量美軍。1951-1952年間，關於「美國駐臺軍事援助顧問團」（以下簡稱「美軍顧問團」）的兩次外交換文，給予美

---

美國與東亞社會》（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3年），頁151-170。

<sup>19</sup> 郭彥伯，〈1965年《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議定及其亞際背景〉，收入林淑芬等編，〈前沿與流動：重探亞際冷戰連結〉（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4年），頁37-92。

軍顧問團人員近似大使館外交人員之優待，如提供刑事豁免、免除各項稅捐，並免費供應執行任務所需的土地、建築、人員和車輛等。<sup>20</sup> 將「顧問團人員」視為大使館的延長，並享有相同的優待。同時，受使團指揮安排，即戰後美國與諸多國家——尤其是北約國家——簽署《共同防禦條約》時常見的安排之一。<sup>21</sup> 惟諸不同的是《共同防禦條約》屬於雙邊協議，亦即雙方基於條約需要派遣至對方國家的人員，皆適用此一安排，但中華民國外交部透過換文賦予美軍顧問團使節待遇，則屬於一種單邊的優惠。至1955年，外交部以備忘錄形式同意將上述優惠對象範圍擴大，並納入隨著韓戰爆發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定而派駐臺澎地區協防的美軍人員。<sup>22</sup>

## 二、美軍特權的冷戰脈絡與國際比較

使館和美軍顧問團人員所享有的外交特權，被擴大到一般美軍的特殊之處，必須放在冷戰時期美軍全球部署的脈絡來理解。中華民國外交部曾調查當時各國派駐的美軍顧問團法權狀況，以及所涵蓋的人員範圍，包括英國、西班牙、希臘、土耳其、伊朗、菲律賓、日本和韓國等國。戰後初期美國在全球海外基地數原本微幅下降，但亞洲及歐洲國家因為韓戰爆發，而擴大美軍基地的規模，<sup>23</sup> 伊朗則在1950年代被美國以遏制蘇聯支持的共產主義為由，策劃政變並恢復王權統治後，受到美國高度地軍事介入。<sup>24</sup> 根據外交部於1959年的調查，這些國家的美

<sup>20</sup> 《中美關於美軍援顧問團來華換文》，1951年1月30日簽換，並於1951年2月9日生效；《中美關於美軍援顧問團應享待遇之換文》，1952年10月23日簽換，並於1951年11月1日生效。

<sup>21</sup> 如丹麥和法國所簽屬之條約，參見 *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 U.S.-Den.*, Jan. 27, 1950, 1 U.S.T. 19, T.I.A.S. No. 2011 (entered into force Jan. 27, 1950) 以及 *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 U.S.-Fr.*, Jan. 27, 1950, 1 U.S.T. 34, T.I.A.S. No. 2012 (entered into force Jan. 27, 1950)。這部分感謝審查人提點。

<sup>22</sup> 「致美國駐華大使館備忘錄抄件」（1955年2月14日），〈美軍地位協定（美武裝部隊人員在華地位）〉，《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42。

<sup>23</sup> James R. Blaker, *United States Overseas Basing: An Anatomy of the Dilemma* (New York: Praeger, 1990), pp. 31-34.

<sup>24</sup> Julian Go, *Patterns of Empir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1688 to the Present*

軍顧問團法權地位，大致可分為：（一）美軍顧問團人員不會被視為外交人員或大使館之一部分，而由地主國專屬或與美國共同管轄，如英國和土耳其；（二）部分美軍顧問團人員被視為外交人員而享有特權，如伊朗僅團長1人、菲律賓僅團長及高級人員共6人、西班牙則僅部分人員約50人；（三）一般美軍及顧問團人員皆構成大使館之一部分而享有外交特權，如希臘、日本和韓國。與臺灣狀況最接近的第三種情況裡，希臘於1956年已透過外交協議廢除給予一般美軍的「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sup>25</sup> 日本亦於1953年簽署協議處理顧問團以外之美軍人員之法權地位。<sup>26</sup> 換言之，在這些國家中的顧問團皆享有外交特權，且一併擴張到所有美軍人員者，僅韓國<sup>27</sup> 與中華民國。

1955-1966年這段期間，在臺灣的全體美軍人員依附於美軍顧問團而擁有幾乎等同於外交人員的各式特權，尤其是擁有刑事豁免權，引發不少社會議論和批評。其中最嚴重的爭議事件，當屬1957年美軍雷諾槍殺劉自然，並經駐臺美軍法庭獲判無罪後，引發憤怒民眾衝入美國大使館內的「五二四事件」。各項爭議促使中華民國政府積極向美國要求簽署正式的軍事地位協定，取消駐臺美軍擁有的全面外交特權，同時限縮顧問團的特權範圍。<sup>28</sup> 在美國方面，五二四事件爆發時，美國認為中華民國警方應對消極，以及使館機密文件外洩等，擔憂將衝擊兩國外交關係。<sup>29</sup> 同時，也充分意識到近代中國的治外法權歷史，激發人民對外國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56-157.

<sup>25</sup> 整理自「簽呈（美洲司）」（1959年6月20日），〈美軍地位協定、中美雙方談判紀錄〉，《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43及外交部於1957年6月7日自文中所述各使館收到之電文，參見〈美軍地位協定參考資料〉，《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59，頁213-220。

<sup>26</sup> *Protocol Amending Art. XVII of the Admin. Agreement Under Art. III of the Security Treaty, U.S.-Japan*, Sept. 29, 1953, 4.2 U.S.T. 1846, T.I.A.S. No. 2848 (entered into force Oct. 29, 1953).

<sup>27</sup> 韓國在1950年簽署的《大田協定》，確立駐韓美軍由美國行使專屬管轄權，參見Sung Soon Cho,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harles L. Cochran and Hungdah Chiu, eds., *U.S.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s with Asian Countries: Selected Studies*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1979), p. 50.

<sup>28</sup> 「為據國防部呈以五二四事件之發生源於美軍顧問團官兵享有充分外交豁免權應向美方交涉修改協原協定令希遵照由」（1957年6月23日），〈美軍地位協定函電〉，《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49，頁55。

<sup>29</sup> “Discussion at the 325th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Meeting Held on May 27, 1957,”

人特權的不滿，以及亞洲民族主義浪潮的催化，促使國務院有意就駐軍法權達成更明確的協議。<sup>30</sup>

二戰後美國於世界各地大量駐軍，因而簽署各種版本不一的軍事地位協定（Status of Force Agreement）。其中，北約和日本的版本因由地主國擁有概括式的刑事管轄權，而成為各國爭取的範本。然而，當年美國在國內壓力等影響下，已不願再提供如北約版本的地位協定，中華民國如前述在1955年已先將美軍顧問團特權擴及一般美軍，已處於不利的談判立場，而美方無意改變當時優待的現況。最終加上越戰導致美軍人數激增，以及中華民國要與韓國、菲律賓等周邊國家談判進度比較的國族情緒等時間壓力下，只能以德國的軍事地位協定為藍本，概括捨棄刑事管轄權，僅列舉危害國安、殺人、強姦、搶劫、縱火和販毒等6項特別嚴重的罪刑，絕對必要撤回捨棄管轄權。<sup>31</sup> 儘管與中華民國最初談判的期待頗有落差，但此歷經近十餘年的協商，終於限縮長久以來所享有的顧問團外交特權。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在1965年正式簽署，於立法院通過後隔年生效。至於顧問團特權一節，中華民國原本幾度與地位協定併案提出限縮，如僅限執行公務時有刑事豁免，或僅限校級以上官員得有優待，但皆遭美方強力反對，由於擔心反而拖延《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談判進度，便未再提出。<sup>32</sup> 此後便形成本案所涉及的美國人分別從屬的3種刑事豁免身分：外交／美軍顧問團人員、《在華美軍

---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496565/USDD?u=twncs183&sid=bookmark-USDD&pg=2>.

<sup>30</sup> “Country-by-Country Study of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184706/USDD?u=twncs183&sid=bookmark-USDD&pg=128>.

<sup>31</sup> 前段簡述《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背景、協商至簽署過程，更細緻的討論和佐證檔案可參考郭彥伯，〈1965年《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議定及其亞際背景〉，收入林淑芬等編，〈前沿與流動：重探亞際冷戰連結〉，頁37-92。

<sup>32</sup> 「中美雙方對美軍地位協定是否適用於美軍援顧問團一節所持立場」（1960年4月9日），〈美軍地位協定函電〉，《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49，頁244；「本部洽辦美軍地位協定案經過節要」（1960年4月），〈美軍地位協定函電〉，《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49，頁76。

地位協定》規範下的美軍，以及一般外國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一般（外國）人民在臺灣的法律身分，受到戒嚴或總動員體制作用，其實也具有某種例外性。一般認為，臺灣的「非常體制」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國家總動員法》及《戒嚴法》中即已成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則在1960年後透過國民大會逐漸取得《憲法》規範的依據，<sup>33</sup> 藉由屬於「例外法」的動員戡亂及戒嚴時期相關法規，達成威權統治的目的。<sup>34</sup> 在此背景下產生的「特別刑法」<sup>35</sup>，對一些犯罪採取較重的刑度，或使一般非軍人接受軍事法庭審判。例如，1955年頒定的《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便稱是「戡亂時期為肅清煙毒，防止共匪毒化，貫徹禁政」，曾涉國際販毒的盜墓案嫌犯白濟傑，正適用此一特別刑法，經高等法院判決即定讞入獄。<sup>36</sup>

從美國的角度來說，威權統治其實有利於美軍基地的穩定，<sup>37</sup> 但特別刑法的存在，是美方在《在華美軍地位協定》談判過程，一度強調不接受美軍受中華民國司法管轄的理由之一。美方主張，中華民國若想在搶劫、販毒等案件中擁有管轄權，就必須將美軍排除適用特別刑法。<sup>38</sup> 從煙毒案的審判來看，雙方政府對

<sup>33</sup> 薛化元，〈戰後台灣非常體制的形成問題〉，收入許志雄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立憲國家之課題與挑戰：許志雄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3年），頁16-38。

<sup>34</sup> 王泰升，〈台灣近代法律體系的确立〉，《月旦法學雜誌》，第66期（2000年11月），頁170-182。

<sup>35</sup> 「特別刑法」是指因特殊需要或補充普通刑法不足，僅適用於特定之人、事、時、地的刑事法律。在轉型正義與戒嚴體制研究裡，廣泛被用來指涉當時一系列在既有刑法基礎下加重刑罰的法律，此一用法也可見於當時美國對臺灣法律狀況的討論與談判中。詳情參見劉恆奴、劉后安，〈特別刑法〉，收錄於「國家人權記憶庫」：<https://memory.nhrm.gov.tw/NormalNode/Detail/39?MenuNode=13>（2025/4/21點閱）。

<sup>36</sup> 白濟傑涉入的國際販毒案詳情見本文第四節。

<sup>37</sup>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Possible Future U.S. Air Base Development on Taiwan,” MS Subject Files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States). Archives Unbound,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SC5110280405/GDSC?u=twncs183&sid=bookmark-GDSC&pg=141>.

<sup>38</sup> 郭彥伯，〈1965年《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議定及其亞際背景〉，收入林淑芬等編，《前沿與流動：重探亞際冷戰連結》，頁75-77。



部分毒品——比如大麻菸——的持有和販售，懲治態度確實存在極大落差。<sup>39</sup> 最終，中華民國在談判中寧願直接放棄對美軍的部分管轄權，也不願接受將美軍排除適用特別刑法，某種程度上可說是為了維持其「非常體制」的正當性。

### 三、特權的動態調整與外交協商

前文分析戰後美國人在臺灣所擁有的多重法律身分，以及相關特權在不同制度安排下的分類邏輯。然而，這些身分與特權的界線在實際運作中往往並不清晰，甚至模糊且持續變動。許多情況下，特權的適用並非直接依據條文，而是透過雙方的外交互動、默契與妥協來確立。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美軍眷屬及文職人員的刑事管轄權。《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尚在協商階段時，這些原受美軍司法管轄的在臺美國人，原擬依協定與美軍人員一同納入「非重大刑案由美方管轄」的範圍。但美方在協定簽署前通知，由於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已將平民（包含美軍眷屬、文職人員等）排除於軍事法庭審理之外，這些人的刑事管轄權將不再受《在華美軍地位協定》保障，而由中華民國完全管轄。<sup>40</sup> 這正是因美國國內司法判決所引發的定義變動案例。

還有一種例子是透過外交協商，擴充法律身分的認定範圍。例如，美國紅十字會和馬里蘭大學派遣來臺的人員，經協商後被納入《在華美軍地位協定》，視同美軍文職人員來保障。<sup>41</sup> 相較於「美軍」的認定，此類「（美軍）特約承辦人」更常作為一種外交特權協商和擴充的彈性身分。如1958年起來臺建設散波無

<sup>39</sup> 張力，〈駐臺美軍菸毒問題的個案研究〉，收入杜春媚編，《冷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3年），頁171-180。

<sup>40</sup> 「美國駐華臨時代辦高立夫致外交部長沈昌煥第十八號照會（譯文）」（1965年8月31日），〈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及其有關參考資料專輯〉，《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9。須注意這並不代表美軍眷屬及文職人員就不再適用《在華美軍地位協定》，他們仍享有協定中關於刑事管轄以外的其他優惠，比方減免稅收。此外，在此封照會裡，美方強調由於他們仍對眷屬及文職人員有一定的行政處罰權，希望中華民國政府盡可能利用美方的行政處罰，來取代刑事追訴。

<sup>41</sup> 「照譯在華美軍地位協定談判紀錄」，〈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及其有關參考資料專輯〉，《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9。

線通訊設備的柯林斯公司人員，即透過外交協議享有等同美軍顧問團人員的外交特權；<sup>42</sup> 1966年《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生效後，該公司人員依法轉置於協定下。但1969年，美國駐華大使館主張，由於該公司人員多數工作係執行美國軍援計畫及軍事顧問團任務，建議將其重新納入美軍顧問團特約承辦人，此一主張獲得中華民國同意。<sup>43</sup> 相較於《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特約承辦人，轉為美軍顧問團的特約承辦人，意味著有更多外交豁免和稅收優惠。

由於特約承辦人的認定需經中華民國政府的同意，美方只能建議，無強制力，這通常屬於外交上額外賦予的優待。就檔案來看，美方不時替其承包商爭取成為《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特約承辦人，凡是由美國駐華大使館提出的申請，中華民國原則上願意以個案方式提供優待。<sup>44</sup> 既然是優待，也就可能收回或暫緩。1966年，泛美航空（Pax American）派員來臺辦理駐越美軍來臺渡假的業務，美使館便洽請外交部給予這十多名辦事人員等同於在華美軍的特約承辦人地位，外交部在沒有什麼爭議的情況下予以同意，後續幾年，隨著該公司人事更動或與美軍續約，都能順利向外交部申請更新名單或展期。然而，1970年2月，泛美航空董事長哈拉比（N. E. Halaby）表示公司考慮開闢美國與中國大陸間航線，外交部得知後，「為表明我方立場並促使該公司覺悟起見」，決定擱置展延案。<sup>45</sup> 直到當年6月，考量該公司未再有開闢中國大陸航線的動向，外交部才同意繼續提供特約承辦人地位。<sup>46</sup> 這顯示，中華民國政府仍會視情況調整特惠待遇，

<sup>42</sup> 「（節略）外交部茲向美國大使館致意並聲述」（1965年1月20日），〈在華享受部分優遇機構（一）〉，《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100500-0078。

<sup>43</sup> 「關於確認美國柯林斯公司特約承辦人之地位事」（1969年3月19日），〈在華享受部分優遇機構（一）〉，《外交部》，典藏號：020-100500-0078。

<sup>44</sup>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articipants, Office of Mr. Ts'ai, April 17 1970,” MS Subject Files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States). Archives Unbound,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SC5110281542/GDSC?u=twncsl83&sid=bookmark-GDSC&pg=8>.

<sup>45</sup> 「關於可否同意延展泛美航空公司特約承辦人地位事」（1970年3月4日），〈駐越美軍承辦人在台地位〉，《外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55/426.1/87。

<sup>46</sup> 「關於續延泛美航空公司駐台辦事處之特約承辦人地位事」（1970年6月8日），〈駐越美軍承辦人在台地位〉，《外交部》，檔號：A303000000B/0055/426.1/87。



作為表達其政治和外交立場的手段。

另一種需要經過協商的情況，是雙方對條約有不同解讀。例如，《在華美軍地位協定》裡的美軍文職單位人員指「在協定地區內受美軍僱用或服務美軍或隨屬美軍之文職人員」，但排除中國籍人員。在1971年時，美方主張因「陽明山計畫」來臺的美軍琉球工程處菲律賓籍雇員，符合協定內容，應該享有文職人員的待遇。然而，中華民國方面卻認為，不論比照日韓所簽署的地位協定，或者就其條約精神，這裡的文職人員當然就是以美籍為限。<sup>47</sup> 此案牽涉到的是全臺各美軍單位所雇用的第三國籍雇員，<sup>48</sup> 當時聯合委員會的首席代表陶格思（C. J. Douglas）將軍和北美司副司長錢復無法達成共識，只能轉報大使館與外交部洽商。<sup>49</sup>

本節已探討美國人在臺可能具有的多種法律身分、其形成的背景，並與冷戰格局下的美國盟國進行參照，同時強調此身分認定可能藉由法律解釋與外交協商而持續變動。基於此已建立的歷史與外交背景，可知美軍特權不僅是靜態的法律狀態，而是一個透過多重身分、冷戰時期國際比較、持續協商與主權議題，共同形塑的複雜過程。接下來，將具體透過美軍藏匿人犯案的個案，深入分析聯合委員會將如何作為此特權再協商的平台。

### 叁、從藏匿人犯案看聯合委員會的制度角色與局限

美軍杜蘭及克萊孟斯所犯的藏匿人犯案，並不屬於《在華美軍地位協定》中所列由中華民國管轄的6大嚴重罪行，因此它最終被交由中華民國審判，是因當時

<sup>47</sup> 「關於地位協定美軍『文職人員』定義解釋案說帖」（1971年1月29日），〈OKED之地位及其文職人員之待遇〉，《外交部》，檔號：A303000000B/0045/426.1/3。

<sup>48</sup> 根據1957年的一份報告來估算，第三國雇員大概占整體美國軍職及文職人員總人數的一成。“Appendix to Frank C. Nash’s Report on U.S.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Country Studies—Taiwan,”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288161/USDD?u=twncsl83&sid=bookmark-USDD&pg=5>.

<sup>49</sup> 「報告（六十年三月三日于北美司）」（1971年3月3日），〈OKED之地位及其文職人員之待遇〉，《外交部》，檔號：A303000000B/0045/426.1/3。

政府根據協定，首次提出撤回捨棄管轄權的請求，最終獲得美方首肯的一樁特殊案例。本節將呈現協定生效後的各項議題，主要在什麼樣的架構下被協商討論，以及藏匿人犯案的協商過程。

## 一、聯合委員會的設置背景與制度定位

在理解美軍特權如何因多重法律身分與外交協商而呈現出動態與模糊性後，接下來必須聚焦於一項制度性的協商機制——聯合委員會。該機構根據《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第十八條設置，被作為中美雙方協調特權爭議、處理協定適用問題的正式平臺，但其實質運作成效仍有待觀察。本文將從其制度定位與雙方期待差異出發，鋪陳後續個案操作與結構問題的分析基礎。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於1966年正式生效後，中華民國與美國雙方即遵循協定第十八條，「成立一聯合委員會，俾中美雙方得藉以互相磋商因實施本協定而引起之各項問題」，然而此一委員會的前期籌設過程並不順利，甚至原本極有可能破局。1965年9月，在協定正式簽署的一個月後，中華民國外交部便召集一次準備工作會議，商討將來聯合委員會的組成方式。據外交部的調查，當時與美國簽署協定的各國，雖然大多有設立聯合委員會的條文，但實際上只有日本正式設置，因此便成為唯一的參考範本。<sup>50</sup>就外交部而言，來自日本的調查報告顯示此一聯合委員會的設置頗有成效，尤其在以外務省美洲局局長和協防司令部副司令為雙方正代表的架構下，設置包括契約糾紛、設施、氣象等多達17個小組，因應日美雙方在軍事合作上會觸及的各項議案，<sup>51</sup>即希望可以比照辦理。

然而美國方面，已決定由協防司令部參謀長為正代表，同時也希望中華民國方面派遣高階軍事將領作為代表。換言之，這將會是一個軍方對軍方的委員會。美方的論據是認為聯合委員會所涉事項，以及《共同防禦條約》下各項合作的執

<sup>50</sup> 「商討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生效前準備工作會議紀錄」（1965年9月29日），〈美軍在華協定聯合委員會〉，《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31。

<sup>51</sup> 「呈報美日聯合委員會之組織及職掌」（1965年10月28日），〈美軍在華協定聯合委員會〉，《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31。

行，皆是軍方較為熟悉。此外，美方希望將大使館和外交部之間的協調作為最後階段，在聯合委員會無法解決的問題，尚可透過外交途徑來解決。<sup>52</sup> 美方以「軍方人員比較熟悉各項問題」的說詞，顯然沒有充分意識到眼前狀況是「美軍在華」，美軍的行政支援、電訊交通、郵局、稅捐、海關檢查、司法問題等議題，對承受美軍的地主國而言，都不是單純靠當地軍事部門就能夠處理的。不過，中華民國方面似乎並未充分掌握美方堅持區隔軍方與外交部門的理由。在駐外軍人刑事管轄權的議題上，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其實一直存在根本態度的分歧，國防部基於保護和管理軍人的立場，堅持由美方擁有完整的管轄權，免除本國軍人受外國法律的制裁，國務院卻注重與盟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傾向減少不必要的政治摩擦，而採取更為彈性的態度。<sup>53</sup>

1965年11月初，美方在組成「軍方對軍方委員會」這件事情上仍頗為堅持，對於日本的狀況，美方則解釋那是因為在日美聯合委員會組成時，日本還沒有國防機構。中華民國方面卻也沒有要讓步，認為若美國不同意，那就只能比照北約的狀況，不設聯合委員會。<sup>54</sup> 至11月底，北美司司長蔡維屏與美國大使館參事林貴士會談，才確認使館向國務院提出建議後，國務院已同意照中華民國方面的建議，由外交部與美國軍方代表籌組聯合委員會。<sup>55</sup>

1966年5月正式召開第一次聯合委員會，中華民國首席代表為北美司司長蔡維屏，與會單位人員包括國防部後勤參謀次長室、司法行政部刑事司、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賦稅署、警務處外事室、外交部禮賓司；美國首席代表為協防司令部參謀長華敬士准將，與會單位包括美空軍三二七師、美軍協防司令部海軍供應處、後勤處、軍法官及美國大使館秘書。會中確立此一聯合委員會日後運作的

<sup>52</sup> 「關於組織中美聯合委員會案說帖」（1965年11月17日），〈美軍在華協定聯合委員會〉，《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31。

<sup>53</sup> 詳細背景可參見Stephen G. Craft, *American Justice in Taiwan: The 1957 Riots and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pp. 1-7; 47-59。

<sup>54</sup> 「關於組織中美聯合委員會案說帖」（1965年11月17日），〈美軍在華協定聯合委員會〉，《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31。

<sup>55</sup> 「外交部蔡司長與美國大使館林貴士參事談話記錄」（1965年11月26日），〈美軍在華協定聯合委員會〉，《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31。

幾項原則，包括聚會時間無硬性規定，會議地點由外交部或協防司令部輪流舉辦，<sup>56</sup> 暫時先成立司法及軍事兩小組，並同意在委員會未召開時，雙方首席代表亦可作非正式的意見交換。<sup>57</sup>

後續的聯合委員會大致維持3-5個月召開一次，並於1969年另設財稅聯合小組。委員會處理的議案範圍頗為廣泛，包括對協定內容細節進行協商，比如撤回捨棄管轄權的請求期限21日應由何時起算、重大到什麼程度的案件美方應主動通知中華民國；有些則涉及協定下的優惠範圍，比如美軍支付水電公用費用的計算方式；又有些是爭議個案，包括美軍福利社的廢棄牛肉外流、清泉崗基地排水設計問題導致周邊民眾損失的賠償等等。委員會上多半不會討論議題細節，而是將議題交由小組研議，再針對小組研議結果進行決議。<sup>58</sup>

## 二、藏匿人犯案中的協商過程與制度實踐

聯合委員會雖具有制度上的正當性，然而實際進入運作層面時，卻不一定能發揮預期效能。藏匿人犯案作為中華民國首度針對非重大刑案主張撤回捨棄管轄權的案例，不僅具有重要的外交象徵意涵，也成為檢視聯合委員會實際功能的切入點。本小節將透過外交文件與協商紀錄，揭示如何透過使館與顧問團的非正式管道進行溝通，顯示聯合委員會在面對特權爭議時的局限。

回到美軍藏匿人犯案，此案受社會關注，逃逸嫌犯郝斯曼等人當初犯下的侵害墳墓案，就引發大量民眾好奇前往板橋林家祖墳一探究竟，現場熱鬧，「據最保守的估計，亦在萬人以上」，甚至有民眾搭乘計程車、摩托車遠自臺北市區、桃園前來，旁邊的廣場成了臨時停車站，並引來小販設攤。<sup>59</sup> 中華民國政府考慮到本案自郝斯曼的侵害墳墓案從發生、判決定讞至其潛逃，「各報紙曾經大幅刊

<sup>56</sup> 後續多於臺北賓館或中山北路美軍顧問團之美軍俱樂部舉行。

<sup>57</sup>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第一次會議紀錄」（1966年5月10日），〈歷屆聯合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115。

<sup>58</sup> 本段概述聯合委員會運作狀況，參見外交部彙整1966-1974年之簡要會議紀錄：〈歷屆聯合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115。

<sup>59</sup> 〈墓地現場 觀眾擁擠〉，《中央日報》，1966年10月21日，版3。

載，引起社會普遍之關心」。因此，杜蘭和克萊孟斯所犯之藏匿人犯案，若不交由中華民國審判，「勢將引起不良之後果」，為此呈報行政院，於1968年7月獲准撤回捨棄管轄權，並由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通知美國海軍供應司令部，美方立即表示不同意管轄權之捨棄，此案遂由聯合委員會協商處理。<sup>60</sup>此時的外交部清楚此案原本並不屬《在華美軍地位協定》所列舉的6大罪行，而自協定生效後，中華民國從未提出撤回捨棄管轄權，本案可說是創舉，同時也可作為一「試驗個案」（Test Case），從外交的角度考慮，應當是有利的一舉。<sup>61</sup>

1968年10月，本案先經聯合委員會司法小組第四次協調會議，此次會議中華民國代表為北美司副司長錢復，出席人員包括司法行政部、外交部、國防部及警務處人員，美方代表則為美軍協防臺灣司令部的班魯比（L. H. Benrubi）上校。中華民國方面即強調此案涉嫌協助判決確定之人犯偷渡離境，「嚴重損害中國司法之尊嚴」，有必要行使刑事管轄權。美方則回覆這已超出司法小組的權限範圍，須提請聯合委員會商議。<sup>62</sup>除了所謂「司法尊嚴」之外，中華民國代表的考量，還可見於其內部會議時，警務處提出「本案經報章透露後，輿情反應不良，對我警方指責尤甚」，再一次凸顯中華民國處理類似事情時的民情考慮。<sup>63</sup>

1969年1月，聯合委員會召開第十次會議，針對美軍藏匿人犯案管轄權進行討論。北美司司長湯武陳述中華民國撤回捨棄管轄權的理由，但美方首席代表戴思樸（John A. Des Portes）准將表示此事已超出權限，建議「提請雙方政府階層商討」。戴思樸另以兩名美軍在臺任期已屆滿為由，即將奉調離臺，希望能討論兩人的扣押時限，認為這仍在聯合委員會可以處理的階層。然後湯武表示，兩

<sup>60</sup> 「事由密（司法行政部函外交部）」（1968年8月20日），〈中美後勤合作協定；美軍杜蘭藏匿人犯；美軍特權〉，《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4。

<sup>61</sup> 「關於美軍杜蘭及克萊孟斯涉嫌協助盜墓定讞犯郝思曼偷渡出境案，呈請可予同意撤回捨棄由」（1968年7月7日），〈中美後勤合作協定；美軍杜蘭藏匿人犯；美軍特權〉，《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4。

<sup>62</sup>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中美聯合委員會司法小組委員第四次協調會議紀錄」（1968年10月7日），〈中美後勤合作協定；美軍杜蘭藏匿人犯；美軍特權〉，《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4。

<sup>63</sup> 「報告」（1968年10月7日），〈中美後勤合作協定；美軍杜蘭藏匿人犯；美軍特權〉，《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4。



人不得離境的時限牽涉到案件管轄權，經外交途徑討論的結果，擬不在此時答覆。<sup>64</sup> 此協商過程可以看出，雙方都試圖在聯合委員會的階層達成對自己有利的提案，然而就本案來說，雙方首席代表被賦予的權限又都受限，使得此案最終仍只能循其他外交管道協商。

1969年4月2日，美國大使館表示美方同意中華民國撤回捨棄管轄權的要求，但有兩個附帶條件：一是同意本案屬涉及中華民國司法重大利益的特殊案件，不構成日後案件之先例，亦不構成中華民國可撤回捨棄管轄權的案件新類別；二是對杜蘭及克萊孟斯之任何控訴，將僅限於《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的藏匿人犯罪。<sup>65</sup> 簡單來說，是強調此案不可作為後續的判例，並限制兩位美軍受到審判的範圍。

杜蘭等人得以交中華民國審判顯然是一起特例。冷戰前期駐外美軍大約只有33.7%會受到地主國審判，特別注意這是所有地區的統計數字，亦即包含在雙方皆有管轄權的情況下，多數美軍仍不會受到地主國審判。<sup>66</sup> 若考慮到有簽署條約或秘密協議，只在特別重大案件保留管轄權的國家，比如日本，美軍受地主國審判的比例更降至3%。<sup>67</sup> 對照與雷諾案同一時期的日本吉拉德案，駐守於群馬縣的美軍吉拉德，據稱向農婦坂井拋擲空彈殼引誘其撿拾後射殺，此殺人案已符合日美協議交由日本審判的條件，然而美方一開始試圖主張吉拉德的行為屬執行公務，試圖審理此案。<sup>68</sup> 這說明即使在有條文支持的情況下，地主國仍需要對管轄權據理力爭，更何況是條文以外的情況。不過，觀察冷戰時期各國的狀況來看，

<sup>64</sup>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中美聯合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錄」（1969年1月7日），〈中美後勤合作協定；美軍杜蘭藏匿人犯；美軍特權〉，《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4。

<sup>65</sup> 「為美國大使館對美軍人員杜蘭及克萊孟斯肇事案所提兩項瞭解本部可予同意復請查照由」（1969年4月2日），〈中美後勤合作協定；美軍杜蘭藏匿人犯；美軍特權〉，《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4。

<sup>66</sup> Asif Efrat, "Facing US Extraterritorial Pressure: American Troops in Foreign Court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4:1 (January 2022), pp. 246-247.

<sup>67</sup> 「駐華美軍人員地位協定（部長在立法院報告摘錄）」（1959年3月6日），〈美軍地位協定函電〉，《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49。

<sup>68</sup> 參見呂迅，〈冷戰時期的美軍雷諾茲案：兼與吉拉德案比較〉，收入杜春媚編，《冷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頁151-170。

確實在涉及地主國主權象徵或引發群眾憤怒時，比如1960年代美軍撕毀土耳其國旗案，即使是不屬於刑法上特別嚴重的罪刑，美國仍可基於外交上的同情考慮，將案件交地主國審理。<sup>69</sup>

### 三、制度局限與美方內部結構的權力運作

就藏匿人犯案來看，聯合委員會作為一個共同商議決策單位的功能顯然有限，部分原因根植於制度本身的結構性因素。美國從一開始就希望保留外交高層作為最終的協議管道，聯合委員會美方首席代表，至下設的專案小組，皆以軍人為主。而相比於軍方，美國外交部門顯然更願意妥協和彈性處理，真正的妥協並不在聯合委員會內達成。聯合委員會仍扮演一個雙方交涉和初步理解彼此意圖的重要平台，其會議紀錄仍是我們窺探當時在華美人所涉重大事件怎麼被處理的良好素材。至於其權限範圍內究竟能施展到什麼程度，則有待進一步整理和觀察。

除了這些協商卻未必能做成決議的議案，聯合委員會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主持或參與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在華美軍地位協定》架構下的各項協議、契約和行政程序的制定。自1951年美軍顧問團的外交部換文，至《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生效前的15年間，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協議和換文即多達45項，包括較受矚目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陽明山計畫」，軍事與情報合作的協議如《艦艇租借協定》、《散波協定》、《防情互換協定》，後勤合作協議如《中美海空軍搜索救護現行作業程序》、《駐華美軍及顧問團人員物資運輸及裝卸規定》，以及生活支援如《盟軍及眷屬居住須知》、《外事處各招待所作業中美協定》等。<sup>70</sup> 至1966年《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生效後，這些細部規範的擬定和協調便成為聯合委員會的工作，在短短半年間即有多達15項新簽署的協議，主要皆涉及後勤支援及費用分攤，如《國軍支援在華美軍駕駛技工協議書》、《電信服務

<sup>69</sup> Asif Efrat, "How to Handle Offending Troops Overseas: The U.S. Military's Legal Strategy During the Cold War," *Armed Forces & Society*, 49:2 (February 2022), pp. 496-497.

<sup>70</sup>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簽訂前十五年來中美軍事協定及換文目錄」（1968年7月1日），〈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及其有關參考資料專輯〉，《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9。



合約》、《引水及服務費協議書》。同時，針對《在華美軍地位協定》未能處理到的細節，也還再訂立《中美共同防禦期間處理在華美軍刑事案件條例》，此條例即處理《在華美軍地位協定》談判過程中，美方質疑的一罪兩罰問題，<sup>71</sup> 將已受美軍事法庭審判的案件排除《中華民國刑法》第九條適用。<sup>72</sup> 談判過程美方作為理據、也被中華民國方面所承認的刑法程序不符合現代國際法趨勢一事，在此後被逐漸修訂。

前述這些條文擬定及本節藏匿人犯案協商歷程，均說明美軍在臺所享有的「治外法權」，絕非在《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簽定後，即一錘定音。無論是細部規範或實際運作，仍充滿許多協商與折衝空間，且從此協商過程亦得以觀察中美之間在外交、軍事合作及司法主權上的動態角力。聯合委員會作為制度協商的機制即存在局限，此局限既源於中美權力的不對等，也反映美方內部制度結構的分層機制。下一節將聚焦在空間面向的分析，說明此種美軍特權如何在基地與物流體系中被實踐與挪用。

## 肆、美軍特權的空間性與基地管制

美軍在臺灣享有的諸多特權，一般被直接理解為「治外法權」，這是延續自清朝起的領事裁判權的歷史記憶。莊詠鈞指出美國在二戰結束後的《中美新約》宣示放棄在華治外法權，但仍透過《中美關於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換文》享有對美軍的刑事管轄權，可說是治外法權的局部復活。<sup>73</sup> 此一換文直到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後仍持續發生作用，甚至1957年雷諾案的美方調查人員亦錯

<sup>71</sup> 即《中華民國刑法》第九條：「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

<sup>72</sup>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簽訂後中美軍事協定等有關文件目錄」（1968年7月1日），〈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及其有關參考資料專輯〉，《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009。

<sup>73</sup> 莊詠鈞，〈治外法權的局部存續：《中美新約》後的駐華美軍刑事案件〉，《政大史粹》，第37期（2022年9月），頁59-78。

誤地援引此一已廢除的條例來佐證美方擁有看管權。<sup>74</sup> 治外法權作為一種恥辱和歷史創傷，對中華民國政府來說是難以忘記的，不論是雷諾案引發的爭議，或在 1966 年《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立法院都曾疾言厲色對此做出批評。<sup>75</sup> 本節將進一步指出，美軍在臺所享有的特殊待遇，遠不僅止於法庭上的豁免權。延續本文對於美軍「特權」多樣性與實際運作的關懷，並回應藏匿人犯案中郝斯曼得以利用清泉崗基地潛逃所揭示的問題，本節聚焦於這些特權如何體現在有形的實體空間管制與無形的物流機制上。

## 一、基地作為特權運作的實體空間

首先是實體空間的部分，儘管美軍出入境之檢查程序於《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第七、八條被賦予特殊待遇，但郝斯曼逃離出境一事，還疊合了美軍基地空間所享有的特權。依據《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等相關協議所劃設和使用的軍事基地，不僅是軍事部署的據點，更成為一個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和管制規則的空間場域。

事件發生之後，中華民國空軍總司令部針對清泉崗基地的安全措施進行通盤檢討。從檢討報告中看來，清泉崗基地的安全管制問題，除了一些空軍可自行改善的部分，如安檢人力、通訊設備和邊牆防護設施等之外，其中難以克服的瓶頸就在美軍方面。清泉崗基地分為一般基地區域及美軍駐節區域，後者由美方自行負責，不受中華民國軍方干涉，該報告直言「美軍在基地內之各項活動，形成獨立範圍，不受我方干涉」、「美軍進出基地物資，由裝卸、運輸至存儲，均以『美國國家財產』之名義，自行辦理，我方無權過問」，以及「美軍飛機載運人員，起飛、降落基地，因無具體規定，無法會同施檢，易為不法分子利用作為走私、販毒或非法出入境之工具」。<sup>76</sup>

<sup>74</sup> Stephen G. Craft, *American Justice in Taiwan: The 1957 Riots and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p. 61.

<sup>75</sup> 見〈美軍雷諾上士槍殺劉自然案經過並備質詢請公決案〉，《立法院公報》，第十九會期第七期，1957年5月24日；〈本院外交國防司法三委員會報告審議我國與美軍簽訂在華美軍地位協定案〉，《立法院公報》，第三十六會期第八期，1966年1月14日。

<sup>76</sup> 「空軍清泉崗基地安全措施改進方案」（1968年6月17日），〈清泉崗空軍基地安全措施

令中華民國當局困擾的這些規定，出自於《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包括第三條之同意紀錄「美國軍事當局得在依本協定供應之地面及設備內指定若干地區僅容許當地美國司令官授權之人員進入。前述地區之內部安全由美國軍事當局負責」、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美軍（包括其授權之特約承辦人）所使用之美國政府財產輸入或輸出或存放於協定地區內時，應不受搜索、扣押或其他檢查」，以及第二項第一款「美軍人員或文職單位人員，及其家屬之身體及財產，在美軍所使用之地面及設備內，除經雙方政府主管當局同意者外，應不受搜索、扣押或其他檢查。」這些規定使得清泉崗基地的美軍專用部分，形成一個在人員和物品流動上不受中華民國管制的特殊空間。甚至在基地設施的建造上，中華民國都難以掌握美軍的行動。1966、1967年清泉崗基地先後發生兩次美軍彈藥庫排水系統故障，損害周邊農田和灌溉系統的事件，中華民國當局協助農民請求賠償的同時，要求日後美軍新建任何設施時，應事先協調，但遭美方拒絕「任何設施」字樣的強制要求，僅允許一定程度的事先協調。<sup>77</sup>

回到郝斯曼逃逸離境一事，由此次潛逃出境帶動的基地安全措施改善，顯然沒有收到充分的成效。至1971年聯合委員會首席代表，就美方所提「開放清泉崗及臺南機場供休假人員進出境」一事，<sup>78</sup> 中華民國代表錢復便指出，美軍潛逃案仍持續發生，至少在1970年2月至1971年1月這一年間就有涉嫌搶劫、煙毒及殺人未遂等3起案件共4名美軍，在美軍看管下潛逃。<sup>79</sup> 顯然美方未依照當時的協議，嚴格控管清泉崗及臺南機場僅供作戰人員出入境，非作戰任務人員僅可使用松山機場，比如煙毒案美軍嫌犯依頓（原名不詳）便是利用假證件，從清泉崗機場搭機潛逃返美。<sup>80</sup>

---

案》，《空軍總部》，國防部藏，檔號：57\_562.7\_3512\_1\_2\_00027100。

<sup>77</sup> “Joint Committee for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Minutes of Eleventh (11th) Meeting, 12 June 1969,” MS Subject Files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States). Archives Unbound,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SC5110280405/GDSC?u=twncs183&sid=bookmark-GDSC&pg=141>.

<sup>78</sup> 此前，駐越美軍渡假人員搭乘飛機來臺，皆於松山機場降落。

<sup>79</sup> 據《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美軍、文職人員及眷屬在訴訟各階段的看管（Custody）皆由美國當局負責，但中華民國方面可提出轉移看管權的要求，美方應予以同情考慮。

<sup>80</sup> 「報告（于北美司）」（1971年2月17日），〈美軍重大案件參考資料〉，《外交部》，

松山機場給中華民國帶來的空間管理困擾也不遑多讓，在1970年的中美聯合委員會上，中華民國方面即反映，1月美方不顧國防部再三反對，在松山機場廢料場內興建（駐越美軍）休假處理中心，任由美軍休假人員及未獲授權之本地人民，包括女性進出。美方對此的回應是，當初並未認知到國防部對此有堅決反對，至於進出管制失當一節則與事實不符。<sup>81</sup> 不論美方的解釋說詞是否準確，案至少顯示中華民國對此空間的疑慮和難以實質掌握。

作為一般美國人，郝斯曼案顯示會透過美軍用機場潛逃者，並不只是美軍，若參考其他檔案所透露的線索，甚至可能不只美國人。1970年，警備總司令部制定「一七一七專案」，針對政治異議人士如郭雨新、李敖、謝聰敏、魏廷朝、楊玉城、黃啟明、雷震、彭李純（彭明敏妻）、彭攸（彭明敏兒）等9人進行監控，防範其偷渡出境。除了這9人名單外，其親屬也可能被監控列管。<sup>82</sup> 1975年警總便注意到一名美軍退伍少校金斯根（Jean Skinner），他在松山機場擔任維修工程師，擁有兩架自日本標購、擬修復後轉售予高棉的美援DC-3型飛機。<sup>83</sup> 據調查1975年5月中旬，彭明敏胞姊彭淑媛曾邀請金斯根至其婦產科醫院協商偷渡赴美事宜，且彭淑媛已辭退醫院一名護士、變賣值錢醫療設備，顯然有偷渡疑慮。<sup>84</sup> 5月底時，金斯根由松山機場搭乘美軍包機前往泰國烏拉拋基地，警總即研議是否可拒絕其再入境，並據松山基地的美軍憲兵透露「金斯根專作幫助他國罪犯偷渡出境之勾當」。<sup>85</sup> 至9月，金斯根甚至借宿於彭淑媛家中，警總更加大其可能偷渡

---

檔號：A303000000B/0057/467.1/0017。

<sup>81</sup> 「第十五次會議」（1970年12月9日），〈歷屆聯合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外交部》，檔號：11-07-02-13-05-115。

<sup>82</sup> 陳致好、薛化元，〈一七一七專案〉，收錄於「國家人權記憶庫」：<https://memory.nhrm.gov.tw/NormalNode/Detail/116?MenuNode=14>（2024/11/16點閱）

<sup>83</sup> 「請加強管制嚴防管制對象彭女偷渡」（1975年9月27日），〈一七一七專案〉，《國防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60/0553.31/1000.2/1/053。

<sup>84</sup> 「社道字第0631號」（1975年6月6日），〈一七一七專案〉，《國防部》，檔號：A305000000C/0060/0553.31/1000.2/1/053。

<sup>85</sup> 「美籍金斯根有協助彭淑媛偷渡之顧慮，請查證並研議，可否拒絕金某再入境惠告」（1975年6月4日），〈一七一七專案〉，《國防部》，檔號：A305000000C/0060/0553.31/1000.2/1/053。

的疑慮，<sup>86</sup> 不過根據10月警總線人轉述彭明敏母親陳金英對彭淑媛的談話：「金某既有飛機又是美國人，難怪要被誤會把你載走。月前金某來臺，飛機已修好賣給菲律賓人，此次渠住宿飯店，不住淑媛家，以免麻煩。」就結果來看，彭淑媛最後終究沒靠著金斯根偷渡，但從警總的高度戒備和機場美軍憲兵的傳聞來看，此類偷渡管道顯然是存在的。<sup>87</sup>

## 二、物流中的特權機制

除了對實體空間的掌控外，美軍特權的另一重要面向，體現在對人員與物資「流動」的管制機制上。這些機制亦根植於協定所賦予的特殊豁免，使得特定的物流渠道得以繞開中華民國的海關、郵政與稅收體系。

較廣為人知的例子，即因地位協定而享有免稅優待的美軍福利社（Post Exchange, PX），美軍在1969年先是主張根據《在華美軍地位協定》，退役美軍也可以使用這些便利設施。<sup>88</sup> 1973年又基於福利社商品的黑市交易氾濫為由，主張PX應向所有在臺美國居民開放。<sup>89</sup> 以上提案雖未獲得中華民國同意，皆足見美國透過《在華美軍地位協定》所提供的法律架構，持續擴大其特權範圍的企圖。

不論是透過開徵稅費或禁止進口，某個程度上都屬於一種流通管制，美軍在碰到這類管制措施時常有特權，使得違禁或未稅品得以流通。1964年1名美國駐

---

<sup>86</sup> 「請加強管制嚴防管制對象彭女偷渡」（1975年9月27日），〈一七一七專案〉，《國防部》，檔號：A305000000C/0060/0553.31/1000.2/1/053。

<sup>87</sup> 「彭逆明敏之妻李純言談資料」（1975年10月23日），〈一七一七專案〉，《國防部》，檔號：A305000000C/0060/0553.31/1000.2/1/053。

<sup>88</sup> “Joint Committee for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Minutes of Eleventh (11th) Meeting, 12 June 1969,” MS Subject Files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States). Archives Unbound,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link.gale.com/apps/doc/SC5110280405/GDSC?u=twncs183&sid=bookmark-GDSC&pg=141>.

<sup>89</sup>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ongressional Relations Marshall Wright to Senate Harold E. Hughes,” MS Subject Files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States). Archives Unbound,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SC5110285350/GDSC?u=twncs183&sid=bookmark-GDSC&pg=2>.



臺海軍通訊輔導中心的華籍職員，便被查獲利用美軍所享有的豁免權，從香港走私衣料、絲襪等貨物，並混入美軍公用進口物資提單內，蒙騙中心負責人及美國使館人員簽證後，再向海關提貨，<sup>90</sup> 透過美軍不受檢查和納稅的物流通道，達成走私的目的。

會利用這類豁免海關檢查的管道走私的，不只是美國軍方人員。與郝斯曼一同犯下盜墓案的白濟傑，因國際販毒入獄而認識王道，即利用美軍軍郵來進行運毒而被捕。美國軍郵寄送之郵件，屬於《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第八條明訂免於海關檢查的類型。1958年白濟傑與友人李達拉（Lee S. Darragh）一同來臺，由李達拉以郵寄手錶為名義，向美軍顧問團三等技術兵馬偕（原名不詳）借用軍郵號碼，隨後白濟傑赴香港將鹽酸海洛英裝入一小保險箱中，假稱自己是美軍駐日顧問團洛克（原名不詳）中尉，由香港美軍郵局投遞給馬偕，請馬偕轉交李達拉。不料馬偕收到鐵箱後發現是毒品，便報告顧問團長官，並與省警務處會同顧問團憲兵組配合，仍假裝與李達拉會面，將其逮捕，白濟傑亦於幾日後由港返臺時遭捕。<sup>91</sup> 白濟傑和李達拉雖對犯行矢口否認，辯稱不知寄送毒品，只是他人托寄保險箱，但美國大使館出具有力的調查錄音證據，包括香港軍郵局錄音證實白濟傑在投遞時，曾稱自己是從臺灣派來調查機密案件，因此寄送的是機密文件、不得拆開，另大使館還派員至香港訪問保險箱商店老闆，證實保險箱為白濟傑所購買，因此白濟傑和李達拉兩人一審判處15年及12年有期徒刑，<sup>92</sup> 兩人均不服上訴。1959年高等法院判決，白濟傑部分的犯罪事實與調查一致，但「念其為一外僑，對我國法律稍乏瞭解，酌情減免」，改判12年徒刑，李達拉則認為缺乏具體積極證據，不應俱依共犯論處，改判無罪。<sup>93</sup> 審判長章粹吾還特別諭知李達拉「中國法律是重視證據的」，在審理外國人時，展示自身司法體系的嚴謹性。<sup>94</sup>

<sup>90</sup> 「為向美國駐台海軍通訊輔導中心調查高尚志走私次數及數量一案函請查照會與見復由」（1964年3月2日），〈美軍包商轉運行李〉，《外交部》，檔號：A303000000B/0053/499/0047。

<sup>91</sup> 〈美僑販毒案昨偵結起訴〉，《聯合報》，1958年7月22日，版3。

<sup>92</sup> 〈美僑販毒案昨二次開庭〉，《聯合報》，1958年8月20日，版3。

<sup>93</sup> 〈美僑販毒案二審宣判〉，《聯合報》，1959年1月30日，版4。

<sup>94</sup> 〈外僑販毒案二審定讞〉，《中央日報》，1959年1月30日，版4。

根據《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此為終審判決。<sup>95</sup>

從本節討論的諸多案例可見，在司法管轄的特權之外，《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及其相關安排，也在基地空間的運作和物流體系的特殊豁免上，建立起一套廣泛的「美軍特權」體系，各種法外的流通得以發生。將這些特殊待遇為「美軍特權」，是因為它名義上是源自外交與軍事合作需要，為提供美國軍事人員、機構或行動的便利。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特權在實務上所創造出各種管道，往往不僅限於美軍人員使用，還包括其他美國人，乃至臺灣本地人民，都可能被運用。這種現象展現此特權體系在冷戰時期帶來的複雜性與多重效應。

## 伍、結論

本文以圍繞著美軍藏匿人犯案所牽連的一系列案件作為引線，呈現戰後臺灣「美軍特權」的多種樣態，明晰其在什麼樣的歷史和法律背景下形成、具體如何運作，以及涉及哪些協商。至於所探討的「特權」，指的是美軍基於各種需要，創造出特殊待遇的法律制度空間或實體空間。這些「特權」不僅是純粹法律條約的未竟之處或暗地裡的違法行為，而是當美國透過條約和外交協商，在中華民國境內懸置當地部分的法律、爭取特殊待遇時，產生意圖或非意圖效果。文中諸多與司法主權有關的案例，在當時和後世學界皆常以「治外法權」這來理解，但本文特別強調「特權」的多種樣態，而不僅談「治外法權」，一方面跳脫「法權」的限制，另一方面希望亦納入美國平民乃至臺灣人民等，這些並非特意被賦予「特權」的對象，卻利用美軍特權的實踐案例。<sup>96</sup>

<sup>95</sup> 這裡亦可延伸觀察到有別於「美軍」，還存在不同種形式的「例外」，包括「外僑」本身是否就具有一定的豁免或減刑特權，以及戡亂時期下懸置常態法的特種刑法。

<sup>96</sup> 本文對於「特權」的討論，極大程度延續了受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啟發的「例外狀態」政治理論思潮，參見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著，薛熙平譯，《例外狀態》（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0年）。儘管，阿岡本所討論由主權者決斷的例外狀態，集中在如戒嚴等緊急狀態，一些研究者如Stoler，皆延伸運用其理論概念，將創造層級化主權和例外視為帝國構成的重要特徵，參見Ann Stoler, “On Degrees of Imperial Sovereignty,” *Public Culture*, 18:1 (December 2006), pp. 125-146。另外，治外法權仍是談討帝國與主權的



在第二節首先帶出的是顧問團人員、在華美軍和一般美僑這3種在司法上享有不同層級特權的基本類型，這些身分並非出自單一協定，而是透過戰後一系列外交換文、條約和制度逐步建構。《地位協定》簽署之前，顧問團人員即被視為使館一部分而取得全面的刑事豁免。1955年後，中華民國又進一步同意將此待遇擴及一般在華美軍，使兩者在實務上皆享有治外法權等特權，這幾起重大案件爆發導致社會反彈，促使《地位協定》的簽署。俟協定生效後，顧問團人員維持享有外交豁免，一般美軍則在條文列舉的特定情況下中華民國始有管轄權。本節最後也指出，這三種身分間的劃分並非截然清楚，在協議生效後，仍持續協商和變動。

第三節則呈現「在華美軍地位協定聯合委員會」——作為處理藏匿人犯案等司法問題的協商平台——所設立的歷史背景、制度設計、運作狀況及主要議題內容。透過具體條文和運作紀錄，說明此機制提供雙方意見交換和形成解決方案的功能，並無最終決策權。在此架構下，本節以藏匿人犯案為例，探討此案件得以交由中華民國審理的不尋常，並反映美方在外交談判上的彈性，以及對中華民國訴求的策略性限縮。最後在美國刻意區隔外交與軍事部門的安排下，純粹以美軍人員為代表的聯合委員會缺乏更高層級的政治權力，使得此委員會實際決策的權限不盡充分，這是其制度設計上的根本缺失。

第四節進一步討論除了司法管轄權之外，美軍在臺灣所創造的其他特權，包括基地空間管制與物流體系的特殊運作方式，比如中華民國政府對幾個軍事基地無法掌握，或是美軍郵件和物資通道豁免海關檢查等。這些特權一開始是圍繞著美軍的需要，但其實際運用也常溢出軍事人員的範圍，衍生為人員和物資流動的

---

重要概念，Margolies較明確以「主權例外」(sovereign exception)闡述美國將自己從他國法律中脫離的治外法權操作核心，見Daniel S. Margolies, *Spaces of Law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Extradition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the Borderlands and Beyond, 1877-1898*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1), pp.4-11。Inoue Fumi則更直接將治外法權和例外體制結合並用以解釋美軍在沖繩的法律實踐，見Inoue Fumi, "The Politics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Post-Occupation Japan and U.S.-Occupied Okinawa, 1952-1972" (Ph.D. dissertation, Boston College, 2021)。作者希望藉由對「美軍特權」更廣泛地理解與認識，回應或延續這些對於治外法權與例外狀態的討論。

特殊空間。此一空間的形成與擴張，不論是國家行動者積極透過協商納入更多半軍事或非軍事的身分，或者非軍方人員的違法使用，都呈現軍事特權滲透至不同制度中所產生的複雜效果。

這也進一步帶出我們對美國「治外法權」的反思。對治外法權和地主國主權的理解，通常強調其對在地主權的侵蝕和衝突關係，比較特殊的視角可能指出，在這些案例裡，治外法權所引發的爭議，及當地爭取國家司法主權的修辭，協助了司法改革及國家建構的過程，<sup>97</sup> 這點呼應中華民國對自身刑事程序的檢討，或是中華民國法院審判運毒案時，一面對外國人酌情減免，一面捍衛自身司法系統的尊嚴。然而，從本文所整理的一些案件來看，運用「美軍特權」的犯罪行為，卻也未必是主權國家——比方美國——所樂見的，或有意替本國人民爭取的特殊待遇。儘管在郝斯曼的潛逃案裡看到大使館人員的協力，但在白濟傑販毒案裡，大使館則反過來提供白濟傑被判刑的有力證據；又或是監控彭淑媛一案，不少政治異議分子透過這種特權的挪用，展現其對於國家政權的不服從，這也超出一般探討治外法權時，以兩個國家主權競合的視角；最後，如果將這種特權視為一種主權行使下的「例外」或特殊狀態，那麼同樣時常被認為例外狀態的戒嚴，及其下的特別刑法，不同種例外結構如何交互運作，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

<sup>97</sup> Lauren Benton, *Law and Colonial Cultures: Legal Regimes in World History, 14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0-252.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外交部》（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美軍包商轉運行李〉。  
〈駐越美軍承辦人在台地位〉。  
《外交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中美後勤合作協定；美軍杜蘭藏匿人犯；美軍特權〉。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及其有關參考資料專輯〉。  
〈美軍在華協定聯合委員會〉。  
〈美軍地位協定（美武裝部隊人員在華地位）〉。  
〈美軍地位協定、中美雙方談判紀錄〉。  
〈美軍地位協定函電〉。  
〈美軍地位協定參考資料〉。  
〈歷屆聯合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  
《外交部》（臺北，國史館藏）  
〈在華享受部分優遇機構（一）〉。  
《國防部》（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一七一七專案〉。  
《空軍總部》（臺北，國防部藏）  
〈清泉崗空軍基地安全措施案〉。

### 二、史料彙編

- 吳淑鳳等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中美協防（一）》。臺北：國史館，2013年。  
吳淑鳳等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中美協防（二）》。臺北：國史館，2013年。  
吳淑鳳等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中美協防（三）》。臺北：國史館，2014年。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運作及美軍特權：以1960年代美軍在臺犯案為例

吳淑鳳編，《從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到臺灣關係法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2023年。

### 三、報紙、公報

《中央日報》，臺北，1959-1968年  
《立法院公報》，臺北，1957-1966年  
《經濟日報》，臺北，1967-1968年  
《聯合報》，臺北，1958-1968年。

### 四、專書

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著，薛熙平譯，《例外狀態》。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0年。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出版社，2011年。  
Benton, Lauren. *Law and Colonial Cultures: Legal Regimes in World History, 14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laker, James R. *United States Overseas Basing: An Anatomy of the Dilemma*. New York: Praeger, 1990.  
Craft, Stephen G. *American Justice in Taiwan: The 1957 Riots and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6.  
Go, Julian. *Patterns of Empir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168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Margolies, Daniel S. *Spaces of Law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Extradition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the Borderlands and Beyond, 1877-1898*.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1.

### 五、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王泰升，〈台灣近代法律體系的確立〉，《月旦法學雜誌》，第66期（2000年11月）。  
呂迅，〈冷戰時期的美軍雷諾茲案：兼與吉拉德案比較〉，收入杜春媚編，《冷

- 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3年。
- 林正峰，〈從國際法之觀點論民國46年美軍雷諾殺人事件〉，《政大法學評論》，第4期（1971年6月）。
- 林桶法，〈從劉自然案論述1950年代美軍顧問團的問題〉，收入黃克武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年。
- 栗國成，〈1957年台北「劉自然事件」及1965年〈美軍在華地位協定〉之簽訂〉，《東吳政治學報》，第24期（2006年12月）。
- 張力，〈駐臺美軍菸毒問題的個案研究〉，收入杜春媚編，《冷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3年。
- 郭彥伯，〈1965年《在華美軍地位協定》的議定及其亞際背景〉，收入林淑芬等編，《前沿與流動：重探亞際冷戰連結》。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4年。
- 莊詠鈞，〈治外法權的局部存續：《中美新約》後的駐華美軍刑事案件〉，《政大史粹》，第37期（2022年9月）。
- 薛化元，〈戰後台灣非常體制的形成問題〉，收入許志雄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立憲國家之課題與挑戰：許志雄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3年。
- 蕭道中，〈從內戰到冷戰：韓戰與中美軍事合作的開展，1949-1950〉，《台灣史學雜誌》，第33期（2022年12月）。
- Cho, Sung Soon.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harles L. Cochran and Hungdah Chiu. eds., *U.S.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s with Asian Countries: Selected Studies*.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1979).
- Efrat, Asif. "Facing US Extraterritorial Pressure: American Troops in Foreign Court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4:1 (January 2022).
- Efrat, Asif. "How to Handle Offending Troops Overseas: The U.S. Military's Legal Strategy During the Cold War." *Armed Forces & Society*, 49:2 (February 2022).
- Stoler, Ann. "On Degrees of Imperial Sovereignty." *Public Culture*, 18:1 (December 2006).

## 六、學位論文

Inoue, Fumi. “The Politics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Post-Occupation Japan and U.S.-Occupied Okinawa, 1952–1972.” Ph.D. dissertation, Boston College, 2021.

## 七、網路資料

陳致妤、薛化元，〈一七一七專案〉，收錄於「國家人權記憶庫」：<https://memory.nhrm.gov.tw/NormalNode/Detail/116?MenuNode=14>（2024/11/16點閱）。

劉恆姣、劉后安，〈特別刑法〉，收錄於「國家人權記憶庫」：<https://memory.nhrm.gov.tw/NormalNode/Detail/39?MenuNode=13>（2025/4/21點閱）。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ongressional Relations Marshall Wright to Senate Harold E. Hughes,” MS Subject Files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States). Archives Unbound,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SC5110285350/GDSC?u=twncsl83&sid=bookmark-GDSC&pg=2>.

“Appendix to Frank C. Nash’s Report on U.S.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Country Studies—Taiwan,”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288161/USDD?u=twncsl83&sid=bookmark-USDD&pg=5>.

“Country-by-Country Study of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184706/USDD?u=twncsl83&sid=bookmark-USDD&pg=128>.

“Discussion at the 325th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Meeting Held on May 27, 1957,”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496565/USDD?u=twncsl83&sid=bookmark-USDD&pg=2>.

“Joint Committee for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Minutes of Eleventh (11th) Meeting, 12 June 1969,” MS Subject Files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States). Archives Unbound,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

SC5110280405/GDSC?u=twncsl83&sid=bookmark-GDSC&pg=14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articipants, Office of Mr. Ts'ai, April 17 1970,” MS Subject Files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States). Archives Unbound,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SC5110281542/GDSC?u=twncsl83&sid=bookmark-GDSC&pg=8>.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Possible Future U.S. Air Base Development on Taiwan,” MS Subject Files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States). Archives Unbound, Accessed March 7, 2025, <https://link.gale.com/apps/doc/SC5110280405/GDSC?u=twncsl83&sid=bookmark-GDSC&pg=141>.